

中日心理学史上的早期联系与交流¹⁾

赵 莉 如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北京

摘 要

本文论述了中日两国最早的心理学的译书出于同一美国心理学原著, 心理学译名相互影响和使用, 最早的心理学期刊同期出版等史实。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自古以来, 两国人民相互交流科学文化, 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日本科学史的起点, 大化革新前后的科学即是移植中国的“隋唐科学”^[1]。在早期的交流中, 中国学术思想输入日本; 中国的古籍中, 有着极为丰富的心理学思想, 其中孔孟儒学、宋明理学、中医药学以及中国化的禅宗佛学等, 对日本的心理学思想曾发生过很大影响。但在明治维新以后的科学技术, 则一直是移植欧美科学, 西方学术思想源源不断地传入日本, 随之也输进了西方心理学。

中日两国的现代心理学, 都不是在自己的土壤上产生的。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 虽然内容极其丰富, 但由于没有使它发展成为一门科学的条件, 也是由西方心理学传入后逐渐形成和发展的。明代末期, 基督教再次传入中国*, 有些传教士著译了有关西方古代和中世纪心理学思想的书。19世纪80年代前后, 在其设立的“教会学校”, 开始讲授心理学课, 并汉译了哲学心理学书。在清末“废科举、兴学堂”改革旧教育, 仿效日本新学制, 日本为西方心理学传入中国曾起过桥梁作用。中日两国心理学早就开始了相互联系和交流。

一、中日最早的心理学的译书出于同一原著

中国最早的一本汉译心理学书——《心灵学》出版于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由颜永京译自美国Joseph Haven(约瑟·海文)著的《Mental philosophy》(《心理哲学》)。我在1982年开始对本译书进行研究。当时我国心理学界对《心灵学》几乎无人知晓。译书仅有上本, 为线装, 著者与书名均未注英文, 原著无从查阅。这时我看到1980年出版的《日本心理学会五十年史》(第一部)中, 载有日本明治八年四月(1875年)文部省出版的日本最早讲述西方心理学的书系由西周译的美国Joseph Haven著《Mental Philosophy》, 书名译称《心理学》。该书序中有“亚墨利加联邦神教学士约瑟奚般著”^[2]。这使我联想到海文是否即是Haven和奚般? 为了得到证实, 在1983年初, 经我所原所长和中国心理学会秘书长徐联仓同志的协助, 向日本心理学会去函探问, 承蒙当届理事长萩野原一教授

1) 本文于1990年5月19日收到。

* 唐代和元代曾传入过两次。

和东京大学大山正教授的大力支持,使我与日本大学文理学部心理学研究室儿玉齐二教授有了联系,儿玉教授是心理学史家,并专门从事《奚般氏心理学》的研究。他复信热情地告诉我,他从我随函附去《心灵学》上本目录的判断,认为百分之九十是不错的(因未见《心灵学》全文不可能下最后结论)。他说:“如日本的‘奚般氏心理学’和中国的‘海文氏心理学’是从同一本原著翻译过来的话,这将是我们的一个重大发现。”随后儿玉教授提供了《Mental philosophy》目录资料、《奚般氏心理学》复印本和他对此书的研究论文^[3]。这使我对颜永京《心灵学》和西周《心理学》进行了比较,确切地证实了中日两国最早的心理学的译书出自同一著者的同一原著。

关于J.Haven及其原著《Mental philosophy》,颜永京及其译书《心灵学》和西周及其译书《心理学》的研究情况,在我过去的拙作中^[4],已有论述。现仅略加补充:

海文(1816—1874)著《Mental Philosophy》于1857年出版,并再版多次,它在美国当时是一本较好的教科书。海文沿用了康德的知、情、意三分法,论述了心理现象。它和我们现今所说的心理学大体相当,尽管当时在西方,心理学还不是独立的学科,从内容上看,其中有不少基本见解都是可取的,显出哲学心理学的进步趋势;但也看出身为牧师的海文没有脱离宗教神学的羁绊。我认为这可能是中日两国皆选译它的主要原因。西周和颜永京在他们各自译书的凡例和序言中都有相似的好评。他们在译书过程中遇到同样的困难,都采取了“选字造词”和“新创称谓”的方法。

西周和颜永京译书的各自历史背景条件及其影响却是不相同的。西周(1829—1897)是日本近代著名的哲学家。他受当时文部省的委托翻译了J.Haven的《Mental philosophy》(1869年版本),把著者名字译为奚般,书名译为《心理学》,由文部省出版,在日本明治初期的开成学校、札幌农学校、同志社英学校等都有使用这本书的记载^[5]。可见该书具有广泛的影响。更突出的是在日本心理学界公认西周是日本最早介绍西方心理学的人,《奚般氏心理学》是日本最早的心理学的译书,并由他首创译称《心理学》,它已载入日本心理学的史册(儿玉教授对此提出异意,认为西方心理学传入日本和使用“心理学”名称更早)。同时,在《奚般氏心理学》译书中,西周把许多英文的心理学的用语首次译成汉语,不少沿用至今,这对西方心理学思想的介绍和传播以及中日心理学思想的交流,有着深远的影响。

颜永京(1838—1898)是中国牧师,他在美国读大学(Kenyon College)时,学习过海文的《Mental philosophy》,回国后,1879年在圣约翰书院主持教务,兼授心理学课,并开始翻译,但作为一本译书正式出版,已是他辞职以后;而且只出版了上本,下本没有付印。在当年发行上本时,曾夹入一铅印卡片,文曰:“近因身体违和,不能校辑自如,所以下本未及同时刊刻,断然不至久延时日,愿诸君共谅之。颜永京具。”卡片背面用英文印出同样的内容^[6]。可能在1889年以后,颜永京一直身体欠佳,或由于其他种种原因,下本终未出版。但手稿存否?尚无从查考。该译书由益智书会校订刊行,它是专为各教会学校编审教科书的委员会(成立于1877年,由美国传教士狄考文任主席^[7];1886年,颜永京增补为委员^[8]),该会规定以“宣扬宗教”为编书重要原则。显然,《心灵学》仅在教会学校有所影响。颜永京比西周迟译《Mental philosophy》4—14年。出版的上本也从未再版,长期以来,我国心理学界对此书无人问津。颜永京所译心理学用语未沿用下来,《心灵学》在中

国远没有《奚般氏心理学》在日本的影响大。

由于这两本译书的名称和书内译语各不相同,我推论他们译书之间,没有发生过联系,是完全独立进行的,而据儿玉教授的调查研究,在颜永京《心灵学》即将出版之前(大约1888年前后),他曾短期访问过日本,儿玉教授推论那时颜永京有可能见过西周的日文译本,不过颜永京的翻译确实在去日本之前就已进行的^[6]。

从我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虽然颜永京早在圣约翰书院讲授心理学课,并首先汉译《心灵学》一书;但我国开设心理学课程可能在此之前,清末在华北的著名教会学校山东登州文会馆(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创办,系齐鲁大学的最前身,现今的山东大学)于1876年升格为书院,分备斋(三年)、正斋(六年)两个学部,正斋第六年即讲心理学课。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在中国教育系统最先开设的心理学课程了^[7]。但尚不知何人讲授?有无译书等情况。还有1877年成立的益智书会,在编纂两套(初级和高级)教科书的决议中,也列有心理学科目^[8]。但均未见当时对“Mental philosophy”的汉译名称是否已称《心灵学》?这样看来,颜永京可能也是“心灵学”名称的创译者。

至于西方心理学思想传入中国的时间就更早了,可以追溯到我国明末外国传教士来华传教时编写的神哲学书籍^[9],其中介绍了西方古代和中世纪的心理学思想。当时,著名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艾儒略等都精通中文、儒家经典,如艾儒略(1582—1649)著的《性学概述》* (1623年著,1646年刊印)是一本采用问答体编的“心理学常识”^[10]。有人认为是“西方最初输入之心理学”^[10]。又如利玛窦(1552—1610)著有《西国记法》(1595年著,约在1624—1640年间刊印),是一本讲记忆术的书,他利用西方记忆术的原则结合中国象形文字“六书”的特点,总结出“识字法”。再如毕方济(1582—1649,意大利传教士)口授,由徐光启(1562—1623,中国明代学者、科学家,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笔录的《灵言蠡勺》(1624年刊印)是论述“亚尼玛(Anima)之学”即灵魂学或灵性学。在上述三本书中都引用了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阿奎那的心理学思想,内容附会中国古代宋明理学,性理之说的思想概念。都是外国传教士用中文自己撰写或口授,未见外文原著。书中充有浓厚的宗教色彩^[11]。

由此使我推想颜永京身为牧师,他很可能阅读过《性学概述》这类书籍,书中的心理学用语对他翻译《心灵学》时是否有借鉴?当然,《性学概述》等仅有中文本,这一问题还可另作对比研究。儿玉教授的论文中曾提到“德川幕府反对基督教在日本流传,所以对于心理学等有关的书籍严加取缔”^[6]。看来,当时《性学概述》这类书籍是很难或不可能传入日本去的。

日本的《心理学》和中国的《心灵学》同译于美国《Mental philosophy》这一史实,确是有益的发现,我与儿玉教授同感这种偶然的一致是极有趣的,二者差不多是同一时期翻译的同一原著,这是中日心理学史上的早期巧合。相隔一个世纪以后,当儿玉教授发表关于《奚般氏心理学》日译本的第一篇研究报告的差不多同时,我也在进行《心灵学》汉译本的研究了,这是现在中日心理学史研究工作上的又一次巧合。我们从1983年初至今,建立了密切联系,不断进行交流。儿玉教授的研究工作逐步深入,成绩显著。他曾远涉美国进

* 翰:通粗,大略之意。

行调查研究写出海文的传记报告^[12];他还两次访问中国,到上海颜永京的出生地和工作过的地方实地考察,并写出颜永京的传记^[13]。他重点对汉译心理学用语作了专门探讨,撰写出系列论文,荣幸地已被我引用。

二、中日心理学译名的相互影响

上文已经涉及了中日两国心理学名称的翻译问题。日语和汉语从语言上说,虽然不是一个语族,但是从文字上说,中文和日文却是“同文”。日本古人学习了汉文,在此基础上编出了两套假名,作为标音,并在日文中使用大量汉字,直至现在。中国历代古籍和汉译佛经传入日本,给日本学者使用汉语、汉字不少凭籍和启发,特别是明治维新以后,接受西方科学知识很快,日本借用中国古汉语作为西方近代学术用语的意译语,而后又被中国从日本借用回来,有的一直沿用至今。中国翻译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书籍,是从明代(16世纪后期)利玛窦东来开始,由于中国学者徐光启等人的努力,译出不少科技书籍,这些中译本的科技书籍也传入日本。正如儿玉教授所说:“日本人除直接阅读西方读物获得知识外,也读汉文的科学书籍,这些书籍首先集聚在当时住在中国的传教士手中,然后经过中国商人之手输入到日本”^[6]。在他论述汉字所起的作用时说:“科学知识本身就是通过汉字传入我国(日本)的”^[6]。他还引用另一位物理学教授宇野良清的话:“近代日本能够在比较短的期间吸收西方科学,幸亏有了汉字文化”^[6]。在19世纪中叶,中国和日本翻译西方科学书籍以及哲学社会科学书籍时(包括心理学),同样使用汉语,汉字造词定名,两国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促进了学科译名、各种译语的翻译工作的彼此交流和相互影响。

中日两国,尤其是日本创译的心理学用语,也是通过上述的途径传入和接受的。关于汉译“心理学”名称的演变及其发展的历史是怎样呢?我们知道,几千年来,心理学一直包括在哲学的母体之中,心理学思想和哲学思想混在一起,相互交织而难分,并且受到宗教的渗透很大,特别在西欧封建社会整个学术都打上了基督教神学的烙印,使心理学成为“神学的奴婢”,乃至17世纪中叶文艺复兴以后,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直至19世纪属哲学中的一部分心理学(即哲学心理学)已具有显著的发展,但有的哲学家本身是牧师,从事神学研究,所撰写的心理学问题专著是宗教唯心主义的。这段心理学未独立前的发展史与传入西方心理学思想或哲学心理学时的汉译心理学名称和用语问题有着密切关系。

中国古代没有“心理学”这一学科名称,“心理学”三字在古书上从未见在一起排列过,就是“心理”二字相连的时候也极少,我国东晋陶渊明(365—427)的诗中:“养色含精气,粲然有心理”,有人认为这二字可能是最早的联缀;但也不和现在的解释相同。古籍中属心理研究的内容称之为“性理”,为“心学”^[14]。

中国最早把现在的“哲学”和“心理学”的名称谓之“穹理之学”和“性学”。这是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在1623年用中文撰写《性学概述》中提出的^[15]。同年,他在《西学凡》一书中,对1610年罗马教皇送给中国七千部书(其中有哲学类书)略述了西方学科分类的概况,把philosophy一词音译为“斐录所费亚”,意译为“理学”^[16]。艾儒略对儒学修养很深,有“西来孔子”之称。显然,他是附会宋明理学和性理之说的概念而用此称的。与他同时另一意大利传教士毕方济,在1624年所写的《灵言蠡勺》引中,把philosophy译音“费禄苏非亚”,译言“格物穹理学”,义取“格物致知”。把Anima译音亚尼玛之学,意称“灵魂学”或

“灵性学”^[17]。直至后来,清代末期颜永京于1879年开始边教边译了《Mental philosophy》,1889年出版,书名译称《心灵学》;1891年山东登州文会馆正斋备斋分年课程表上,明文规定了正斋第六年开设心理学课程,译名为“心灵学”^[8];1896年我国清代戊戌变法时期的思想家谭嗣同著之《仁学》在二十七界说中,提到心理学也称为“心灵学”(可能因他曾精研基督教义和神学有关)。1898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以问答法撰写一本心理学书,却取名《性学举隅》于1904年出版,他因袭了艾儒略早年的“性学”名称。1911年出版华北公理会协和大学校长美国传教士谢卫楼著、管国全译的心理学,书名译称《心灵学》。协和大学的前身河北通县潞河书院于1892年以前即已讲授心理学课^[18],后来1919年改为燕京大学(1952年并入北京大学)。从我国在17世纪初和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对心理学译名的演变来看,凡由传教士或基督教系统所著、译的心理学书多称为《心灵学》这个带有神秘色彩的名称。

中国清代来华的传教士,对philosophy大多因袭艾儒略“理学”的译名。这个译名随着汉译西籍也传到日本^[16]。

在日本最早对“哲学”和“性理学”(即心理学)译名是由西周所著《百一新论》(约1866—1867年开始起草,1874年3月出版)中首先提出。西周最初对philosophy这个词使用过“性理学”、“理学”、“穹理学”等译语,但他都感到不够确切。直到他把希腊语“φιλοσοφία”一词确认为与中国北宋哲学家周敦颐(1017—1073)所著《太极图说》中讲的“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这句话中的“士希贤”(求贤德也)的意思相仿之后,便把“philosophy”直译为“希贤学”。后经反复思考和进一步推敲,把“求贤德”和“哲智”联系起来,又将“philosophy”试译为“希哲学”(即希求哲智之学),最后在《百一新论》中定译为“哲学”^[19]。西周是“哲学”一词的创译者。同时,在《百一新论》中出现他使用“心理”以及“性理学”的词^[9]。比《百一新论》稍迟出版的西周著《致知启蒙》(1874年9月出版)也使用“性理之学”或“性理学”;以及西周其他著作如:《百学连环》、《生性发蕴》、《生性剖记》、《知说》等均借用了中国古籍中“性理”的概念及使用“性理学”的名称,也出现使用“心理上学”、“心理之学”等词。1875年出版《奚般氏心理学》,他在凡例中,仍用“性理”一词,而书名译称“心理学”。书内使用“哲学”和“心理学”(但有时仍用“性理学”)。因此,在日本心理学界一直公认西周译的《奚般氏心理学》是日本最早的心理学译书,并在该书首次使用“心理学”的名称,是西周从“性理学”改译“心理学”,由他所命名。故西周也是“心理学”一词的创译者(关于西周译《奚般氏心理学》是否即是首次使用“心理学”名称,以及由“性理学”改为“心理学”的问题,儿玉教授已进行深入的考证研究)^[3]。

在中国“心理学”名称何时才开始使用的呢?据我现在掌握的材料来看,我认为在1896年以后,大约1900年左右,在清光绪维新变法和颁布新学制的背景下,中国开始派遣留学生去日本;同时聘请日本教师来中国讲学的过程中,“心理学”的名称随之传入我国的。如1898年浙江首批派往日本的留学生生名叫陈槐的,他在日本留学时编辑了一本心理学教科书——《心理易解》(1905年出版)。又如最早聘请来我国讲学的东京大学教授服部宇之吉就是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讲授心理学课的“正教习”。现在我国存有他讲述的中文京师大学堂心理学讲义(庚子辛丑间,即1900—1901年)线装本。这可能是我国最早来自日本的心理学。自西周译《奚般氏心理学》1875年出版后,在我国未发现日译本和重译中文

本。或有可能“心理学”名称随其他日文心理学书在1900年以前传入我国。或如果颜永京于1888年左右去日本时,看到西周的译书。总之,1900年以后,“心理学”名称在中国已较普遍使用。可是当时中国清末时期的一些中国学者,对philosophy和psychology二译名没有明确区分和统一译法。如据philosophy的意义,另有译为“智学”、“心智之学”、“心学”、和“心理学”的,而和Psychology相混淆。甚至还有译为“神学”^[16]的。关于“哲学”名称从日本传入我国可能要比“心理学”名称为早。最早介绍“哲学”译法的是黄道宪(1848—1909),1881年他写出《日本国志》定稿,于1887年出版,书中讲到东京大学的哲学科,注明哲学“谓讲明道义之学”。1896年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上已有哲学科字样;1897年梁启超《读〈日本书目志〉后》亦见同样字样。1898年梁启超在《论学日文之益》一文中讲到:“智学——日本谓之哲学”^[16]。同时,他因“变法”失败,东居日本,已接触了日本心理学,所以他对“心理学”与“哲学”译名有明确区分。如1902年他在《新民丛报》18号“新书介绍”一文中,对《世界学报》上介绍当时“新说名论”的各学科分类把心理学和哲学混淆提出看法,他说:“……其分类颇欠妥惬者,如其中心理学一门,最为鄙意所不敢苟同,统观三号,其心理学门皆论哲学也。”梁启超认为:“日人译英文psychology为心理学,译英文之philosophy为哲学,两者范围截然不同,虽我辈译名不必盲从日人,然日人之译此,实颇经匠意,适西方之语源相吻合。……吾度著者……以为一切哲学,皆心识之现象也,故吾不从东译(哲学)而定以此名(心理学),鄙人窃以为误矣。哲学之大别,有唯心与唯物之两派,“物”者,正“心”之对待也,今惟以心学名之,不几将唯物论全行抹杀乎?若以为所研究之客体虽有心物之殊,而能研究之主体惟在人心,故定以此名。然则宗教学、政治学、法律学乃至一切无形有形之学,何一非以吾心研究之,然则并此诸学而名心理学可乎?且既以philosophy冒此名,则于Psychology又将以何语译之,此吾所不敢苟同也。Psychology与Ethics伦理学皆为Philosophy中之一门,吾以为宜立哲学一门,而以心理伦理皆入之,似为得体矣。”^[20]梁启超对“心理学”与“哲学”译名的区分起了一定作用。从此以后逐渐趋于统一,沿用至今。心灵学一词,后来在教会大学里也改称心理学了。

三、中日最早的心理学杂志同期出版

中国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1912年)。在民初年间,我国早期的心理学研究和介绍一般都在教育方面的杂志上发表。1921年8月中华心理学会成立,(1922年)1月创刊出版会刊——《心理》,这是我国第一种专门研究心理学的杂志。由中华心理学会会长张耀翔任主编,上海中华书局印刷发行。编辑部设在北京高等师范(其前身为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现在的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实验室内中华心理学会总会。

《心理》杂志的宗旨,在创刊号上首先言明:“中华心理学会是专为联络中国心理学专家和素有研究的心理学者而设”,该杂志为学会的“言论机关”。要求会员“承认心理学自身是世上最有趣味的一种科学,他们研究就是要得这种精神上的快乐,办这个杂志是要别人也得同样的快乐;”“承认心理学是世上最有用处的一种科学,不但可用在教育上,还可用在实业、商业、医术、美术、法律、军事、日常生活上。他们研究就是为求这许多的应用,办这个杂志是要让别人也得这些应用。”并且要求会员研究心理学从三方面进行:“一、查明国内旧有的材料;二、考察国外新有的材料;三、根据这两种材料来发明自己的理

论和实验。办这个杂志是要报告他们三方面研究的结果给大家和后世看^[21]”。

杂志内容分类主要计有：“普通心理、实验心理、动物心理、儿童心理、青年心理、社会心理、变态心理、心理学史、各家心理、应用心理、教育心理、智力测验、教育测验、心理界闻等类。”并辟有历史、传记、介绍、通讯、读者论坛等专栏。除刊载论文外，心理界闻较多，如在通讯栏内介绍国外心理学的发展和各国心理学杂志、新书的情况。如欧洲（英、法、德、瑞士）工业心理之概况，美国、法国心理学刊物情况等。同时，介绍国内心理学研究情况，发表《中国学者心理学之研究》，汇集了当时我国著名杂志上有关心理学的文摘简评。

《心理》杂志共出版14期，总共发表150多篇论文，2千余页，计约140万字。撰稿者有陆志韦、陈鹤琴、廖世承、谢循初、艾伟、陈大齐、张耀翔等人。由于经费困难，时局不宁，书局营业大受影响，刊物不能按时排印，于1927年1月停刊。

日本在明治年间，关于心理学研究和介绍，主要是在哲学杂志上刊载。1912年已有单独出版的《心理研究》杂志（在东京），但内容并非专门研究心理学而有其他学科的稿件，“《心理研究》开始以心理学的普及为主，后来实验研究和专题逐渐增多，但还是以教育、美学、医学方面的来稿为多。”^[21]1919年7月京都出版了《日本心理学杂志》，编辑和发行者为日本心理学杂志社，设在京都帝国大学心理学教室内，编辑委员有松本亦太郎、桑田芳藏、野上俊夫以及医务工作者26人。代表者为黑田源次。杂志内容由“原著”和“摘录”构成，要求“发表的论文不仅是心理学的，也有邻近科学的，也有医务工作者的稿件。”^[81]此杂志因编辑和经费上的问题于1922年将编辑工作移至东京帝国大学心理学研究室日本心理学会编辑部，由增田维茂、城户幡太郎任编辑主任，用相同的刊名由岩波书店出版发行。

这新的《日本心理学杂志》创刊号于1923年1月出版，开头即由松本亦太郎提出三条办刊革新方针：1. 鉴于心理学研究领域和研究所正在增加的现状，要求杂志成为专业学者研究的中枢联络机构；2. 鉴于心理学研究领域日益扩大，适应其他学科专业者了解的需要，把杂志办成心理学研究向学术界广为传播的机构；3. 鉴于世界变化的形势，需要心理学应用于提高社会事业的效率，要求杂志把实际生活和心理学结合起来成为调节人的生活活动的机构^[2]。杂志内容分为“原著”和“学界消息”，写稿者多为东京帝国大学的心理学者，均刊专门性论文，并刊登学界消息较多，如介绍国外心理学最近的各种倾向和它们的代表者及著述；报道法国心理学界、德国心理学会的情况。国内心理学团体的活动情况、国内外心理学新书介绍等。后来也因经营性问题，心理学工作者集中力量于1926年4月将《心理研究》与《日本心理学杂志》合并，出版《心理学研究》直至今在。

中国《心理》杂志和《日本心理学杂志》的宗旨方针不约而同，主体内容也相一致，皆为心理学研究专门学术刊物。当时两杂志彼此十分关注，进行交换，相互赞扬和勉励，共同为心理学事业努力作出贡献。

中国《心理》杂志上介绍“自去年（1922）一月中国心理学杂志出版后，日本各教育机构、学者纷纷来函订购或要求交换，并有数种日本杂志特别为本杂志介绍。本年（1923）一月日本亦有专门研究心理学杂志出现，以出版先后论，可谓东方第二种心理学杂志矣。”^[21]由于《日本心理学杂志》后于我国《心理》杂志一年，故谓我国《心理》杂志为东方第一种杂志。然而日本在1923年以前早有单独出版的心理学杂志，已如前述，只不过是

专门研究心理学的杂志。还具体地介绍了《日本心理学杂志》第一卷第一号至四号的题目、作者,并赞扬“在该杂志上投稿者,均对于心理学有精密的研究,为近日日本出版界中最有价值杂志之一,查该杂志有三条方针: a. 为专门研究心理学者唯一的中枢机关; b. 传播心理学之研究与消息于非专攻心理学者; c. 利用心理学,增加作事之效率,与人生的活动。按该志之方针与本杂志之宗旨若合符节。甚愿彼此努力,造成东方最有名之心理学杂志,给西人和后世看。”^[21]

《日本心理学杂志》第一卷三号内有海外通信一篇,特载中国心理学界的活动和对《心理》杂志的好评:“中华民国心理学活动之消息,增田维茂氏已在本年(1923)五月号《心理研究》中介绍过了,中华心理学会杂志所发表的大作,对于理论和实践,均尽善尽美,的确为吾人研究心理学的一种好帮助,我很喜欢,并且很希望彼此以和衷共济的精神贡献于心理学界。在此谨祝彼国心理学界前途的幸福!”^[22]后来,我国《心理》杂志上的论文,有的译出或摘要介绍,被转载在《日本心理学杂志》上。

回溯中日两国早期心理学发展史上相互联系和友好往来,使我们对老一辈心理学工作者的缅怀,铭记他们对心理学事业的教导和期望!同时,增进我们现在的学术交流彼此相互学习和协作。中日两国心理学的发展确有不少类似之处,但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也形成一定差异。日本心理学现在已相当发达,我国心理学也逐步发展起来,希望我们结合各自本国的实际发展自己的心理学,在国际心理学界发挥更大的作用,将在我们两国的心理学史上谱写出新的篇章。

参 考 文 献

- [1] 汤浅光朝著、张利华译,科学文化史年表解说,科学普及出版社,1984。
- [2] 日本心理学会编,日本心理学会五十年史(第一部),金子书房,1980。
- [3] 児玉齐二,《吴般氏心理学》の研究(1),日本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纪要」,第26号,1982。
- [4] 赵莉如,有关《心灵学》一书的研究,心理学报,1983,4。
- [5] 児玉齐二,心理学东渐—汉訳心理学用语の話,日本大学文学部「学丛」第36号,1984。
- [6] 马文驹,颜永京牧师与心理学教学,大众心理学,1983,4。
- [7]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 [8] 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人民教育出版社,1937。
- [9] 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神哲学类),上海中华书局,1949。
- [10] 王云五,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子部第三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
- [11] 赵莉如,最早在我国传入的西方心理学思想的书—评《灵盲蠢勺》、《性学概述》和《西国记法》,中国科学技术史料,1988,1。
- [12] 児玉齐二,「吴般氏心理学」の原著者Joseph Haven(1816—74)について,日本评论社刊,1985。
- [13] 児玉齐二,心理学な中国に初めて紹介した颜永京牧师—吴般氏心理学の研究(3),日本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纪要」,第37号,1989。
- [14] 张耀翔,中国心理学发展史略,教育心理研究,一卷三期,1941。
- [15] 艾儒略,《性学概述》,上海土山湾印书馆重刊,1935。
- [16] 詹军,“哲学”译名演变,哲学研究,1983,11。
- [17] 毕方济口授徐光启笔录,《灵盲蠢勺》,1921。
- [18] 卢茨著、曾钜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
- [19] 贾纯,试论近代日本哲学家西周,外国哲学,1982,2。
- [20] 《新民丛报》,1902,18号。
- [21] 《心理》,1923,第二卷第四号。
- [22] 《心理》,1924,第三卷第二号。

EARLY RELATIONS AND EXCHANGES IN THE HISTORY OF PSYCHOLOGY IN CHINA AND JAPAN

Zhao Liru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ounds the historical facts that both Chinese and Japanese earliest psychological translations came from the same original works of American Psychology. The translated psychological terms were of influence to each other and were used in both countries. The earliest psychological magazines were published successively about the same period.